

民族性更多体现于人物的灵魂(上)

——对话石一宁

□ 钟世华

访谈手记

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核心推动者之一,《民族文学》原主编石一宁先生深耕民族文学领域数十年的编辑实践与理论思考,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要维度。近两年来,笔者逐步聚焦于石一宁先生的文学批评理念与编辑思想研究,围绕这一主题完成的系列研究文章已陆续刊发于相关学术刊物。尽管2017年曾与一宁先生有过一次深度对话,但始终觉得尚有未尽之言待梳理,作为兼具《民族文学》主编、文学评论家、作家与“文学活动家”多重身份的学者,其学术与实践维度中仍有诸多未被挖掘的地方,未在既往的研究文章与访谈中充分呈现。基于此,为弥补既往研究与访谈的不足,笔者于近期再次向石一宁先生提出深度对话的邀约,以期通过更具针对性的交流,完整呈现其对民族文学创作、编辑、批评与传播的思考,为当代民族文学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一手资料与理论参照。

钟世华:一宁老师好,您大学毕业后,除了在原国家农业部待过短暂的时间外,其余时间几乎都是和“编辑”打交道,一辈子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。“编辑”这个职业给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?

石一宁:与其他职业一样,编辑工作也需要一种职业精神。具体而言,文学编辑工作又有其特殊性。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生产,其生产除了作者,还需要编辑的共同参与才能使文学作品(包括理论评论作品)最终完成,成为可以提供给公众的精神产品。

一个文学创作者,需要有文学理想。文学理想作为一种内生力量驱动作者的创作,并指引创作的方向。作为参与着文学生产的文学编辑,同样需要怀抱文学理想。文学理想是一个文学编辑的精神追求、职业尊严与自豪感之所系。当编辑与作者两者的文学理想相冲突时,亦是考验编辑的职业精神的关键时刻。编辑还应该是艺术质量的检验者和看护人,不必非要赢得作者的友谊,守住自己的良知与良心,便已达到一个编辑的职业理想境界。

“为他人作嫁衣裳”,这是对编辑工作的一个传统的形容。形容不一定是准确的,尤其在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现代社会,每个人在得到别人服务的同时也在服务别人。编辑的工作与作者的创作一样,最终都是为读者服务。我不认为在作者与编辑之间能够分出高低贵贱,作者与编辑各有实现人生价值的成就感,两者其实是互相成就的。

编辑既是第一读者,同时也扮演着评论家的角色,无论其是否写评论文章。生活体验与写作能力是作者的优势,在这两个方面编辑不需要与作者比,但在学识上、在文学和审美判断力上,编辑必须与作者比一比,只有如此,才具备与作者对话的能力,才能出色履行审读、修改和编校作品的职责。

有的文学编辑同时是作家或评论家,这一方面使其具有与作者平等对话的自信与底气,另一方面也对其职业伦理构成了挑战。编辑是本职工作,写作是业余工作,不应本末倒置,而应在坚守编辑职业精神的前提下,处理好本职工作与业余工作的平衡。

钟世华:您担任《民族文学》主编期间,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,不仅刊发他们的作品,还为他们撰写了不少的文学评论,对于新人的培养,您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?

石一宁:我觉得对于一个走上文学道路的创作者来说,最关键的是要过好“三关”,即生活关、观念关和技巧关。

生活、观念和技巧,这“三关”的顺序我不是随便排的,而是我认为一个人从事文学创作,所必须依照这个顺序过的三道关。我不认为一个

人能够直接越过前面两道关,而直接跳到技巧关写出文学作品。

我把“生活关”放在文学创作的首位,是因为生活关乃文学创作的基础。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,这是常见常闻也常说的一句话,但真正理解这句话,真正过好“生活”这道关,做起来并不容易。很多写作者做得并不好。题材狭窄、撞车,这是近些年来文学创作的一个短板。我经常利用一些场合,尤其是在鲁迅文学学院的讲台上,呼吁作家们要克服题材狭窄雷同、创作同质化这样一个弊端。我说大家来自各行各业,有的甚至在党政部门工作,你们就写所在系统的生活,所在行业的人和事不是很好吗?怎么一拿起笔来,写的都是家长里短、身边琐事、杯水风波?

我也承认,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才能写得好,但生活也向作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,要把不熟悉的生活变成自己熟悉的生活。所谓“读万卷书”的下半句“行万里路”就包含了过“生活关”这个意思。当然,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条件“行万里路”,对有的作者来说,生活的“面”不可能很大,但至少应该在生活的“点”上深入开掘,对生活的“点”不断地深入观察、见证、体验、研究,这样才是真正地过生活关。

所谓“观念关”,观念是人的思想意识,是我们对主观和客观世界的认识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根据一定的观念从事各种活动、各种工作。我所指观念,当然也包括“三观”,即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,但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,我主要指的是文学创作要过好“具体的文学观”这道关。什么叫具体的文学观?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,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等等。这是文学的一般观念、概念。具体的文学观,我指的是文体观、体裁观、风格观等等这些更贴近创作实践的观念。比如,写小说应该具有怎样的小说观,写散文应该具有怎样的散文观,写诗歌应该具有怎样的诗歌观,等等。这些观念也是很重要的。我认为一个创作者脑子里装了这些观念(即使是不自觉的),才会进入到创作的实践阶段,是他头脑里的这些观念指导他的创作,规定他的创作,他的作品面目如何,是受他的这些文学观念制约的。一些创作误区是错误的文学观念造成的。

要过好观念关,我认为作者的写作观要向最广大的读者群——也就是人民——校正。作家写作如果不是为了自我,不是为了小部分读者,比如写给编辑,甚至写给作家同行看的话,作家如果心中有人民的话,我觉得作品就会有真正的可读性和真正的生动性。

所谓“技巧关”,是指作者既需要厚实的生活体验和正确的文学观,还需要有高超的技巧。巴金有一句名言:“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。”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,并不是说文学不需要技巧,而是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境界的作品,技巧已经失去了痕迹,已经完全与作品的其他元素融为一体,天衣无缝了。宋代诗论家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赞扬盛唐诗人的诗歌:“惟在兴趣,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。”他还用“空中之音、相中之色、水中之月、镜中之像”来形容这种诗的意境,实际上也是一种看不出痕迹的诗的技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无技巧就是一种最高的技巧。但不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达到“无技巧”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,所以写作者还是要学习技巧,尤其是刚踏上创作道路的年轻作者。

钟世华:结合当下的创作环境,您觉得少数民族青年写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?

石一宁:我认为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核心问题,有一些是共性的,非关民族属性,比如对于生活的体验是否深入,认识是否深刻;生活的阅历是否丰富;知识的储备是否足够,等等。无论是否是少数民族,这些问题都是一个青年写作者面临的挑战和考验。

在解决了上述共性问题之后,少数民族青年作者才能考虑创作的个性问题,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,成为自己的创作底蕴和底色,使自己的作品在思想与风格上具有鲜明的辨识度。

钟世华:对于年轻作家的作品,您更看重其创作潜力与创新尝试,还是成熟的文本完成度?



▲2022年,石一宁(左)与钟世华在那书苑合影。钟世华供图

刊物会通过哪些选稿倾向鼓励新生代创作者?

石一宁:一个年轻作者是否有潜力以及创新尝试,是通过作品呈现的,对其有无潜力及创新尝试的判断,也只能以其作品为依据。其作品的成熟完成度,当然是最主要的依据。成熟完成度低的作品,又能显示多大的潜力呢?但另一方面,要求一个年轻作者立马就能与成熟的优秀作家相比肩,多少是不切实际的,但其作品的成熟度要足以显示值得关注的潜力。文学期刊一般会从自然来稿筛选、设立新人专栏和邀请参加培训等方面来鼓励和培养年轻作者。

钟世华:在AI技术深度渗透写作领域的当下,文学作品的创作生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。作为文学期刊编辑,肩负着为读者遴选优质原创作品的重任。面对AI写作的挑战,您认为该从哪些维度提升对AI生成内容的辨识能力,从而确保刊物的文学品质与原创价值呢?

石一宁:AI技术对写作领域的冲击,想必每一个写作者都能感受和体会到。AI集合、综合了古今中外无数人的智慧、学问和成就,在它的渊博、浩瀚和写作速度面前,作为个体的写作者太渺小了、太微不足道了,如果跟它比这些,写作者会有一种彻底的无力感、挫折感甚至绝望感。但正因AI是一个集合体、综合体,至少在现阶段,它缺少个性和有温度的情感。文学创作是离不开个性的,缺少个性的作品不是优秀作品。因此,我觉得作家不气馁,更不能依赖AI写作。从编辑工作来说,从个性的视角、有温度的情感的视角来辨识稿件,是有很大的可操作性的。文学期刊的编辑现在可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AI,而是似是而非的“原创”,是同质化、雷同化甚至是等而下之的抄袭。

钟世华:近年来,文学界“新”声迭起,各类作家群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从聚焦地域肌理的新东北作家群、新南方写作群体,到扎根文化土壤的新浙派、新北京作家群,多元创作生态似乎正逐渐成形,对于这一现象,您有何见解?

石一宁:文学流派的兴起,是文学兴旺繁荣的一种表现。文学流派的出现,可以视为是文学对现实、对生活的呼唤的回应,也是突破既往、力求创新超越的积极探索。但文学流派的成色(生命力),在于成功的创作实践,在于作品的成色(质量)和特色(辨识度)。如果流派缺少创作实绩,作品缺少成色和特色,只能是流于口号和标签的噱头罢了。从创作的实践来看,多元的文学生态不是靠口号和标签来生成的。

钟世华:您曾在《重写刘三姐成为一种新的期待》一文中谈到:“在进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的今天,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语境已经形成,重写刘三姐也因此成为一种新的期待。”那么,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与复杂文化语境中,您认为重写少数民族民间经典面临哪些

关键问题?该如何通过合理策略推动经典的创造性转化?

石一宁:少数民族民间经典经过历史与时间的沉淀,具有相当的审美稳定性。是否有必要重写,首先需要凝聚广泛的共识。共识形成之后,才是重写的开始。

具体到刘三姐题材,事实上重写的版本已经有一些,说明重写是有一定共识的。但重写的版本为何不能广泛流传,为大众所认可?我觉得一是对重写要达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深度还没有形成共识,导致虽然“转化”了,但“创造性”不足,以致让人费解何必重写?二是我认为创造性不是与传统彻底决裂,但也不能新瓶装旧酒,需从时代性、大众性着眼,从新经典的形成所必须的生产与传播手段的变化着手,使新经典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艺术成果,如此之重写才是有意义的。

钟世华:重写后的经典需要怎样才能既保留“民族味”,又拥有“当代力”,真正实现文化特色的活态传承?

石一宁:“民族味”,我理解就是民族元素,包括民族意识、民族风情、民族符号,等等;“当代力”,是指当代意识、时代精神,而不是当代风俗。历史学有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之说,经典重写也应该以成为灌注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的新经典为目标,而不是为重写而重写。一些“重写”不成功,就是没有精准把握当代意识与时代精神,使重写之作沦为肤浅甚至多余之作。

钟世华:2021年您在一次主题培训上特别强调“心怀‘国之大者’”,推动各民族文学交流与互鉴。在您看来,要如何才能称为“心怀‘国之大者’”?

石一宁:“国之大者”有极强的政治属性,“国之大者”事关人民幸福安康、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要事,关乎全局、关乎长远、关乎根本。“国之大者”实际上关系到每个当代作家,对“国之大者”心中有数,才可称为“心怀‘国之大者’”,其作品才可能具备恢弘的视野、格局、气象与气质。

钟世华: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来说,“心怀‘国之大者’”并非空泛的理念,您认为他们该如何将民族文化书写与国家发展大局结合,让作品既保留民族特色又兼具宏大格局?

石一宁:对于文学创作来说,“国之大者”是通过具体的人和事,尤其是通过人来体现的。文学是入学,是形象思维,文学作品是写人的。重大题材、重要题材创作不是以写一堆事为要务,而是同样要写出人的生活、人的奋斗、人的精神,等等。民族特色与宏大格局并不矛盾,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,当然还有将民族文化融合于宏大叙事之中的要求,因为民族文化的元素和色彩也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个性的呈现。